

生命的驯顺与保存：福柯与斯蒂格勒技术观的思想分野

姜凯宜¹, 于水²

-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南京, 210095)

摘要: 在当代欧美左翼思潮中, 福柯奠定了以阐明技术与生命的关系为基础来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的传统。他认为, 技术话语体系以开展治理活动为名驯服生命, 人类传承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传统的方式在于摆脱技术话语控制进行自主言说。相比福柯, 斯蒂格勒更强调技术工具与技术语言的相互作用。他认为技术在人类历史中具有无可替代的保存记忆的功能, 但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无限加速使其原有功能失效, 生命由此遭遇保存危机, 因此, 传承马克思主义的方式在于重新定位技术的历史功效。从福柯到斯蒂格勒, 欧美左翼思潮在“技术—生命”叙事上形成了两种路径, 体现出当下欧美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截然不同的解读方式。

关键词: 福柯; 斯蒂格勒; 技术; 生命; 马克思主义

中图分类号: B565.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6-0012-11

对 20 世纪后期至今的欧美左翼思潮而言, 技术与生命的关系是无法绕开的叙事对象。自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以来, 欧美左翼学者几乎形成了一种共识, 即思考人类生命在技术加速演变中的存在境地是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的入口。作为当代生命政治叙事的开创者, 福柯对“技术—生命”主题的叙事贡献有目共睹。在深受谱系学影响的福柯看来, 技术体系的内核只是由语言序列塑造的认知方式, 生命则是资本主义技术语言裹挟之下的驯顺的肉身^[1]。此后, 福柯的观点一直被诸多当代欧美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翼学者所尊奉^[2]。然而,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探讨同一主题时, 却开创了与福柯具有明显差异的叙事路径。相比福柯对技术话语的猛烈批判, 斯蒂格勒力图揭示技术的另一种可能, 即技术使生命得以保存。对此, 斯蒂格勒表示, 技术所具有的保存生命的力量, 印刻在人类的全部活动中^[3]。他认为, 生命在当下的存在之困与技术存在必然联系, 但由此全盘否认技术的观点同样失之偏颇, 应以一种更具有现实感的方式对待技术, 从而实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力量的合理定位。由此, 斯蒂格勒开创了与福柯有所交织却又差异明显的技术批判叙事。

一、语言与工具：经验的可能

福柯对“技术—生命”主题具有相当深远的影响, 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在方法上的建构, 即

收稿日期: 2023-09-08; 修回日期: 2024-08-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数智背景下马克思机器理论的当代转向与中国价值研究”(24CZX004)

作者简介: 姜凯宜, 女, 山东烟台人, 法学博士, 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助理研究员,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 联系邮箱: jky@nju.edu.cn; 于水, 男, 山东烟台人, 管理学博士, 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江苏地方治理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 主要研究方向: 技术话语

他对本体性概念的否定。福柯认为, 本体性概念的背后均为话语, 人类历史场景中认知体系变化的内核并不是真实知识的积累, 而是语言结构的自我演化。换言之, 孕育于人类历史的认识论, 源自语言结构本身, 当某种语言结构占据主导地位时, 将迫使生命接受其塑造的强力体系的支配。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技术话语已成为无所不在的规范性力量, 生命迎来的从来不是技术体系所赋予的所谓“真理”, 亦不是某种康德式的先验性标准, 而是说教式的语言规范。因此, 任何妄想拥有某种“正确性”认知的努力都是徒劳无功的, 这种努力终究只是语言的自我游戏, 被话语界定而无处藏身的生命则是其造成的悲剧性后果。

(一) 话语的叙事: 对技术的整体批判

福柯认为技术是“洪水猛兽”性质的存在, 更为重要的是, 他试图否认技术体系的实质意义。纵观福柯一生, 他一直试图在方法上否定自康德以来日益凸显的经验性要素的意义。康德认为, 对“可能的经验”的追寻是走向成熟的人类启蒙的体现^[4]。生命探寻经验性因素的活动, 便可视为以悬设性标准为前提的实践。但福柯认为, 此种实践活动导致的结果只是生命更为隐性化地遭受控制, 支持人类开展世俗性实践活动的所谓道德律令从来不是追求精准的理性前提, 相反, 一切看似正当的说教只是辅佐技术话语体系的语言要素。经过福柯的努力, 技术语言的标准本身似乎被抽干了全部内涵, 只剩下某种语言的空壳。福柯认为, 律令不具备任何实质性价值, 人类与其说是被其成功说服了, 不如说是臣服于渴望拥有强力的话语。如他所言, 说教的背后仅是语言构成的“纽带谱系”^[5]。换言之, 康德的论证方法并未给人类描绘出某种走向成熟的启蒙图景, 其唯一的意义便是为生命建构起一种奴役生命的技术语言结构。

技术之于生命, 与其说是某种实体意义上的经验性工具, 不如说是语言要素的游戏, 这可谓福柯毕生努力论证的观点。对此, 福柯晚年将批判的矛头指向了17世纪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福柯认为, 作为坚信技术可以保护生命的启蒙学者, 霍布斯在思想上误导了当代人类。霍布斯所努力维护的利维坦, 在福柯眼中只是一个毫无价值却又全面掌控生命的技术机器, 其全部意义在于强迫生命接受崇尚精准规范的技术语言的支配。也就是说, 技术性力量的无限膨胀所造成的具有迷惑性的结果在于, 生命看似得到了工具装置的保护, 实际上只是技术工具本身所制造的用以使生命心甘情愿臣服的借口。正如福柯所言, 生命接受技术工具的过程意味着将自我托付给精密而又“巨大的网络”^[6]。在此之后, 生命除了驯顺以外别无他法, 这正是拥抱启蒙的生命所难以预料的结局。福柯认为, 一切以实证范式为基础的技术工具研究, 终究只是没有内涵的语言幻象。

毫无疑问, 福柯的观点近乎悲观, 他拆解了“保护生命”的技术话语体系, 将其阐释为某种没有本体内容的专断性的语言结构。福柯表示, 他对技术话语何以获得霸权地位的探讨, 在思想逻辑上受到了尼采的启发。尼采认为, 一切所谓占有真理地位的观念, 一旦其逻辑起点得以厘清, 便只是“腐败的想象”^[7]。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的论点, 自20世纪中期以来得到了欧美左翼学者的高度重视, 被其用于重估启蒙以来备受推崇的技术理性。从福柯的学术生涯来看, 他在方法论上全面彻底反思技术的努力是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这一时期, 福柯致力于反思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以来崇尚技术的语言词汇, 正如他所言, 除了“词汇、句法、逻辑结构或修辞安排”之外, 技术话语别无用处^[8]。分析他的思想观点和兴趣偏好, 甚至可以得出进一步的结论, 即福柯并不喜欢具有工具性特点的方法概念。终其一生, 福柯对方法一词充满敌意。他认为, 这一实证主义词汇充满了现代技术话语的魅惑性色彩, 生命所遵循的任何研究方法, 均无法真正起到造福自我的效果, 方法的本质只是维护技术话语的认知路径。

(二) 语言学的迷思: 对工具的敌意

当代欧美左翼学者普遍认为, 福柯将自启蒙以来世人趋之若鹜的科学技术及由此形成的真理体系阐释为语言结构的做法, 是他为社会批判理论做出的奠基性贡献。在福柯之后, “技术—生命”主题

为欧美左翼思潮所继承,但围绕语言结构本身的论争从未停止。作为将技术体系阐明为语言序列的代表性人物,福柯在被视为晚近批判性叙事先驱的同时,又遭遇到后世的诸多挑战。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便认为,福柯的批判不够彻底,在语言裹挟一切的场域中,对“内涵”的认知已不复可能^[9]。换言之,批判应基于现实展开,在现实感消失之后,批判已毫无意义。然而,鲍德里亚对福柯所奠定的叙事传统的反思,并不意味着他对福柯叙事风格的告别。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左翼学者对技术工具充满了敌意,他们并不反对福柯对技术的批判,而是认为福柯的局限在于并未放弃与技术相关的经验性要素。结合福柯晚年的论述可知,为了论证技术掌控生命的内在逻辑,他加强了对现实技术问题的关注,这在其对政治经济学的借鉴中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因此,鲍德里亚等人对福柯的批评并不意味着彻底颠覆福柯的论述,他们挑战福柯的目的在于进一步摒弃经验性要素。

基于上述逻辑,如果要真正重构福柯所奠定的“技术—生命”主题,那么便需要重新思考现实的工具与语言意识之间的关系。在斯蒂格勒之前,这一进程并未开启。斯蒂格勒亦承认,全社会对技术语言符号的无限推崇已造成生命的“苦难”^[10],这对当代欧美左翼思潮而言是一个长期性的批判性话题。斯蒂格勒将福柯留下的遗产视为值得重视的对象,他一生都未放弃对技术与生命关系的关注。依照他的观点,技术因生命的活动而产生,也终将影响生命。在思考技术与生命的关系时,斯蒂格勒首先表示,人类生命对生活世界的体验是探讨技术的前提,关于技术的“强力配置”逻辑的一切诠释工作均是在生命本身的视域中进行的^[11]⁽¹⁾。从中可以看出,斯蒂格勒在逻辑上与福柯仍存在一定的继承关系。对福柯及其后的左翼学者而言,存在主义叙事被引入了生命存在之场,生命主体的存续、反抗与体验是其难以撼动的基点。对斯蒂格勒而言同样如此,他一生所做的并不是要否认技术与生命之间存在的必然性联系,而是要反思福柯思想中的语言学色彩。

相比当代其他欧美左翼学者,斯蒂格勒摒弃了福柯等人以语言学为基本视域的做法,对“技术—生命”主题进行了重构。斯蒂格勒认为,对技术的价值反思与对工具的分析探讨在社会批判理论中并不是互不相容的两个层面,二者可以实现统一。相比福柯,斯蒂格勒认为技术话语俘获生活世界并不是展开批判性论述的共识性前提,批判反思技术的真正前提在于把握技术工具的缘起。依照斯蒂格勒的观点,关注技术工具的做法不会像福柯等人担心的那样导致批判性精神的泯灭和实证主义地位的增强。在他看来,对经验性因素的阐释,是批判资本主义技术体系的必要前提。对比数十年来欧美左翼思潮的思想观点可以看出,斯蒂格勒批判的是诸多学者忽视经验性因素的叙事趋向,即飘忽不定的语言取代技术工具成为唯一能够诠释的对象。他表示,这一趋向的无限增强,导致了现实感的晦暗不明,其后果便是使批判性叙事不再可能,原本想要抵制工具体系的批判性尝试,在推演到极致之后反而使批判性认知彻底消失。

(三) 叙事的转向: 工具性因素的恢复

斯蒂格勒表达了这样一种立场,即认可技术工具的现实感,将工具与语言视为共同存在的两种要素。人类与技术相关的实践绝不是配合语言游戏的毫无意义的活动,而是掌握和操作技术工具的过程。事实上,斯蒂格勒对经验性因素的关注与法国哲学中的笛卡尔传统有着密切联系。笛卡尔(Rene Descartes)认为,对经验的反思并不会导致主体的覆灭,客体事物与主体体悟是缺一不可的两个层面,二者的平衡是生命获得“实在性”体验的前提^[12]。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存在主义尽管号称继承了从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的平衡主体与客体的思想理念,但存在主义哲学家对语言学的过分着迷使20世纪后期以来的欧美左翼思潮几乎完全否认了经验的意义。相比其他欧美左翼学者,斯蒂格勒与笛卡尔的思想更为契合。斯蒂格勒表示,关注技术的经验性要素是在现代资本主义所造成的“艰难和压抑的时期”的必然选择^[13]。在他看来,哲学家唯有思考技术工具的现实作用,方能在认识技术工具的过程中反思技术造成的后果。斯蒂格勒认为,福柯以来诸多学者错误地将纯粹意义上的语言规范作为关注重点,但却忽视了技术工具的形成与演变过程。

斯蒂格勒认为, 思考语言与工具的关系是构建批判性叙事的起点, 诠释语言的前提在于把握技术工具的厚重现实感。按照斯蒂格勒的观点, 技术语言规范的全部意义在于印证人类对于技术工具的创新、操作、调整与重构过程。如此一来, 斯蒂格勒就推翻了自福柯以来欧美左翼学者的逻辑。他认为,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我们不能从技术语言变幻莫测的外在现象中推导出技术工具已无足轻重的结论, 技术语言的变化只是技术工具加速革新的结果。斯蒂格勒表示, 纵观历史, 技术工具的演变贯穿人类从萌芽到空前强大的全部过程, 技术工具不断成熟的动力源自人类自我保存的欲望。在他看来, 文明的演化与成长源自人类试图进一步掌握和开发技术的实践活动, 人类对技术力量的崇拜性情感植根于人类维护自我“存有”的过程中^{[11][120]}。斯蒂格勒认为, 语言学的错误在于否认技术对人类成长的意义, 他们将技术视为阻碍生命自我保存的力量, 这一观点与技术的真实作用恰恰相反。技术这一海德格尔眼中具有重新“组建”生命可能的可怕力量应当得到反思^[14], 但承认工具在生命存在情境中的地位是首要的。

斯蒂格勒认为, 以福柯为代表的欧美左翼学者从未真正理解生命与技术的关系。但纵观福柯的生平论述可以发现, 福柯从未忽视对生命自我保存的阐释, 他是以一种近乎绝望的心态探讨生命在现代资本主义的技术统治下获得自我保存的可能性的。福柯认为, 生命若要获得保存便要臣服于技术,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 能够存续的只能是驯顺的生命肉身。然而斯蒂格勒认为, 福柯理论的内在逻辑终究源自先验的语言学哲学, 具有非现实、非历史的叙事倾向。换言之, 福柯的错误在于割裂了技术与生命保存之间的真正关系。斯蒂格勒表示, 福柯完全抛弃了历史——历史在福柯眼中, 早已成为语言自我游戏的虚幻情境。斯蒂格勒认为,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 技术工具塑造了技术语言, 语言则使生命能够“感知”到技术的传承^[15]。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存在性危机, 源自生命在掌握技术结构上所遭遇的困境, 但当下的困境并不能说明技术是损害、摧毁生命的完全负面的存在。

二、治理与记忆: 叙事的重构

技术究竟是奴役生命还是保存生命? 斯蒂格勒与福柯对此持截然不同的观点, 从而使“技术—生命”这一命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叙事。斯蒂格勒表现出重构“技术—生命”命题的决心。他认为, 福柯提出并被鲍德里亚等人不断强调的所谓技术裹挟生命的观点, 非但不能描述技术与生命的真实关系, 反而会使生命一词在叙事上成为空洞的概念。斯蒂格勒认为, 在人类的历史过程中, 从不存在脱离经验性因素的生命, 人类生命不可能脱离技术而独立存在, 福柯完全无法自圆其说。如果构建起福柯与斯蒂格勒的对话情境, 那么不难想象福柯对斯蒂格勒青睐工具性因素做法的不满。福柯认为, 技术工具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技术话语统治的外衣, 相应的语言体系以保护生命为名实施无所不在的控制性活动, 日益精细化的治理技艺便是其表现形式。

(一) 对生命的治理: 技术的日常指向

福柯认为, 治理技艺与技术语言结构密切相关, 是技术话语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奴役生命的具体体现。他表示, 社会批判理论不应遵循英美实证主义的逻辑去阐释所谓的“策略”^{[16](4)}, 而应当探讨技术规范通过“何种方式”掌控全社会^{[16](4)}。在福柯看来, 相比传统农业社会的治理术, 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技艺空前依赖技术性的语言力量。他认为, 对启蒙权利的认可、对市场和分工的自主放任的背后是资本主义国家更为隐秘化地对待生命的治理活动, 世俗的技术语言规范占据霸权地位之后, 人类任何面向世俗生活世界的整合性活动都被赋予了合法性地位。福柯强调, 欧美工业文明面向全球的无限拓展, 因为技术语言的全面化覆盖与精细化渗透而成为可能, 人类社会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的过程, 与其说是印证了启蒙权利的高涨与市场体系的建构, 不如说是技术语言将自身全面合理化的过

程。按照福柯的逻辑,自启蒙运动与工业革命以来,资本主义创造了空前强大的技术力量,并倡导以技术来治理生命的活动,但事实上却使生命无法脱离由技术构成的隐性牢笼。

生命在治理中驯顺,是福柯论证“技术—生命”命题时提出的核心观点。论及福柯的这一观点,有必要再次探讨霍布斯的思想。尽管福柯对霍布斯提出并维护的利维坦概念嗤之以鼻,但在批判霍布斯的过程中,福柯一定程度上得出了与他相同的观点。一方面,福柯坚定地认为技术机器无法保护霍布斯口中的生命自由,另一方面,福柯又不得不接受霍布斯揭露的一个现实,即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生命除了接受技术统治之外别无选择。福柯认为,霍布斯的相关论述唯一值得后世的社会批判理论借鉴之处在于其描述了生命无法逃避的技术体系,即真实地诠释了现代生命受制于利维坦的无奈境地,但他认为霍布斯错误地将利维坦视为生命创造福祉的积极性力量。在福柯看来,作为笛卡尔式机械装置观的倡导者,霍布斯没有发现技术机器的邪恶本质,这是他思想的最大局限性所在。福柯表示,霍布斯的论述事实上证明了人类不可能逃离技术机器的统治,他们终将会被“扩展的网络”所俘获^[17],生命没有拒绝的权利,其全部行动皆处于技术话语的支配中。

从这一角度来看,福柯与霍布斯、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在生命必须无条件服从强大力量这一点上达成了共识。但在对待利维坦的态度上,福柯与霍布斯、施密特完全不同,他并不认为以技术为基础的治理活动是利维坦的福音。福柯表示,他只是要向世人揭示技术话语结构的治理技艺,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见证了技术话语依靠治理技艺强化自身力量的过程,社会成员在此过程中被启蒙学者的语言所欺骗,未能意识到自我的生命肉身早已被技术体系所支配。福柯认为,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所谓的安全保障、领土维护与人口配置等要素均属于治理技艺的范畴,这些要素均体现出资本依靠强大技术力量控制全社会。晚年的福柯对安全、领域与人口等概念充满了兴趣,但与英美政治哲学学者不同,他从不承认这些概念的合理性,而是将这些概念纳入治理技艺的语言学视域中,他认为这些概念是被技术话语“配置”的要素^{[16](72)}。在福柯看来,治理技艺只是披着客体化外衣的语言力量,资本主义社会的治理技艺使所谓生命客体化的实践活动变得毫无意义。

(二) 生命的记忆:技术的本真性内涵

按照福柯的逻辑,一切以造福生命为名的治理活动都是技术话语体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外在体现,这些活动本质上不存在任何工具性的价值。斯蒂格勒关注工具性要素并承认技术工具在人类历史活动中的合理性地位的做法,与福柯毕生的努力背道而驰。对于斯蒂格勒而言,他必须回答这样的问题,即如何在摒弃维护全球资本主义统治的实证主义范式之后,重新阐释技术工具的价值。在诠释技术对人类生命存在之境的意义时,斯蒂格勒一再强调技术工具对技术语言的塑造性,但这并不代表他在思想上已偏向实证主义。实际上,斯蒂格勒对实证主义的抵触丝毫不亚于同时期的欧美左翼学者。斯蒂格勒认为,实证主义以维护技术话语为前提对直观经验扭曲化解读的做法,事实上掩盖了生命的真实体验,而此种体验才是诠释技术演变的厚重基础。他表示,人类在体验生活世界的过程中所形成的记忆,有赖于技术工具与技术话语的交互作用,正是因为这种得益于技术保障的记忆,人类才得以世代延续。依照斯蒂格勒的观点,技术工具的创造性演变与技术话语的持续性记录,使人类关于自身生命存在的全部记忆得以清晰加载。

斯蒂格勒认为,技术对生命的价值并不局限于单一维度的工具与语言层面。在他看来,在工具与语言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人类对历史的记忆逐渐产生,技术对历史的“书写”正是记忆的来源^[18]。斯蒂格勒表示,人类的记忆体现出生命主体在研发和调整技术的实践过程中对客体经验的印象。换言之,记忆植根于生命对生活世界的体验活动,技术的功能在于保障记忆内容的真实性。斯蒂格勒认为,既往左翼学者严重忽视了技术工具与技术话语的交互作用对人类认知产生的真实、深刻和持续的影响。按照他的观点,从古至今,人类文明不断延续且日益繁盛,正是有赖于人类能够保持对实践活动的记忆,记忆是文明不断延续的纽带,技术则是记忆的现实基础。斯蒂格勒表示,记忆为技术所塑造又反

过来记录了技术, 使人类能够依靠记忆不断创造和改变技术, 推动历史持续前行。根据斯蒂格勒的判断, 没有植根于技术的记忆, 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就不会出现, 人类也不可能在当代社会获得前所未有的福祉。他强调, 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中, 记忆从未断代, 这证明技术本身并不是绝对地敌视生命的力量。由此, 他得出了这样的观点, 即技术的演变过程, 其实可以理解为真实的记忆生成并印证、保护人类的过程。

相较福柯在提出治理技艺概念之时对技术的彻底否定, 斯蒂格勒提出的生命记忆概念包含着对技术的相对肯定的态度。在斯蒂格勒之前, 欧美左翼思潮将“现象学—存在主义”彻底改造成全面批判技术的思想, 他们将海德格尔晚年追问技术的质疑风格推向极致, 但他们并未意识到现象学在原初时期并未完全否认客体的意义。斯蒂格勒表示, 社会批判理论对客体性的完全忽略, 导致当代的哲学家无法系统诠释人类记忆的缘起和演变进程。他认为, 探讨人类的记忆意味着需要关注现实的技术问题对人类生命意识的影响, 但这并不代表反思、批判叙事的消失。按照斯蒂格勒的观点, 在人类漫长的文明史中, 既有粗糙的“工业性与技术性”的工具创造活动^[19], 又有艺术、文化、哲学的思想建构活动, 唯有把握记忆的真实逻辑, 方能深刻反思技术的复杂影响。他表示, 无论是承认技术对人类的积极效应, 还是反思技术在当代对人类的消极效应, 技术与人类记忆的关系始终是绕不开的探讨对象, 因为记忆使人类的自我保存成为可能。斯蒂格勒通过阐释技术对生命记忆的价值, 强调作为客体的技术工具和作为主体的生命意识是统一的范畴。

(三) 主题的置换: 两种叙事的逻辑之争

按照斯蒂格勒的逻辑, 福柯所提出的治理技艺一词无法真正诠释生命存在的真实情况, 福柯等人的逻辑缺失在于将技术与生命视为相互独立的两个层面。福柯认为, 生命由于被技术话语及由此产生的治理技艺所严密控制, 在资本主义社会失去了独立的栖息空间。在斯蒂格勒看来, 福柯等学者对现代资本主义治理技艺的阐释与声讨, 实质上使长期保护人类的技术被误解为某种罪恶的象征。他进一步强调, 数十年来, 诸多欧美左翼学者对人类的生存危机担忧不已, 认为生命的危机可以通过剥离与技术相关的全部语言规范得到挽救, 殊不知他们最不愿意面对的就是生命与技术的现实关系和由此产生的保证文明延续的真实记忆。与福柯截然不同的是, 斯蒂格勒坚持认为技术与人类的历史相伴相生, 早在茹毛饮血的远古时期, 粗糙的技术工具和由此形成的记录文字便已成为透视人类“意向”的窗口^[20]。斯蒂格勒不无担忧地表示, 一旦技术的功效被全盘否定, 保护人类文明的生命记忆也将随之消失。

纵观自福柯以来欧美左翼思潮对技术的论述便不难发现, 斯蒂格勒的独特之处在于承认技术工具的真实性及其积极效用, 并试图从更为总体性的历史进程中探讨技术与生命福祉之间的必然联系, 但与此同时, 他并未否认技术在当下对人类的消极作用。一方面, 斯蒂格勒认为, 福柯通过批判治理技艺的方式否定技术效用的做法非但无法为生命的自我保存提供明确的方向, 反而会使生命无法认知自身的真实处境。另一方面, 斯蒂格勒一直在思考人类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究竟面临怎样的困境, 这种困境与技术力量的膨胀之间有何关联。与同时期其他欧美左翼学者一样, 斯蒂格勒清楚地意识到, 生命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所遭遇的前所未有的风险与不断发展的技术息息相关, 人类深陷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超级工业”情境之中难以脱身^[21]。对于斯蒂格勒而言, 他必须探讨技术的保存性功能是否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遭遇到失效的危机。

斯蒂格勒表示, 欧美左翼思潮全面否定技术的观点十分荒谬, 但生命的当下困境确实源自技术的突变。也就是说, 人类对技术的持续研发使文明得以繁荣, 然而技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前所未有的加速发展导致了过犹不及的后果。斯蒂格勒认为, 从总体的历史进程来看, 技术并不是天生与生命敌对的力量, 这是福柯以来的左翼学者从未正确意识到的一点, 问题的症结在于, 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对“理性化、计算化”的极致追求使作为理性象征的技术力量不再守护生命^[22]。斯蒂格勒进一步

强调,技术的突变,使生命难以在当下清晰地记忆一切事物。依照他的观点,在漫长的历史活动中,人类寄希望于技术,将技术视为生命的依靠,因而费尽心机地培育技术性力量,并认为随着技术力量的持续增强,人类社会可以真正达到尼采口中的“强横”状态^[23]。斯蒂格勒表示,令人类始料未及的是,生命与技术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矛盾。

三、言说与定位:马克思主义的两种继承

斯蒂格勒认为,生命在驾驭技术时面临的危机是:人类再也无法通过技术掌握资本主义社会的真实情形。他表示,这一危机并非源自语言结构的自我演变,而是源自具体的历史进程。斯蒂格勒回溯了从石器时代到当下的人类历史,并以此为基础探讨了“技术—生命”命题。斯蒂格勒认为,当下生命困境的产生实际上有迹可循,其成因应当从与技术相关的人类实践活动中寻找。在他看来,一方面我们应当承认技术力量的失控给生命造成的困境,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基于历史全面地看待技术的影响。斯蒂格勒强调,极致推崇技术的实证主义思维与彻底否定技术的社会批判理论均不可取,哲学家应当做的是从具体的现实动态中思考技术对生命影响的变化^[24]。他表示,同时期欧美左翼学者在探讨技术问题时忽视了现实经验,从而完全丢弃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视野。在斯蒂格勒看来,马克思主义是探讨生命与技术复杂关系必须借助的思想武器。

(一) 围绕马克思的争论:关于生产概念的探讨

实际上,福柯认为自己从未放弃对历史的关注——无论是20世纪60年代对技术话语的阐释,还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对与技术语言相关的治理技艺的探讨,历史一直是较高频率出现的词汇。与斯蒂格勒的不同之处在于,福柯认为历史是由语言规范所塑造的、没有现实意义的存在,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此种规范毫无疑问便是技术话语,技术话语和由此形成的无所不在的治理技艺,使生命的言说必须遵循预先设定的技术认知。福柯表示,他对历史的看法与马克思有所不同,他坚持认为只有通过阐释语言才能使历史的真相“显露”出来^[25],因此重构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是他必须承担的任务。福柯强调,既往所有关注经验性因素的历史研究,非但无法真正探究历史的真相,反而会被实证主义语言所欺骗,社会科学研究者高度重视的所谓历史经验只是虚无缥缈的认知。

长期以来,大多数左翼学者将福柯阐释为“尼采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即以重估价值的思维方式重新看待唯物史观。福柯认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给后世留下的最可贵的财富在于深刻批判并系统颠覆了现代资本主义。但他强调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局限在于忽视了现代资本主义技术对人类的认知俘获,将马克思对物质资料生产的重视等同于马克思赞成技术话语的合法地位,这是他所反对的。福柯认为,唯有借鉴尼采对既往价值体系进行重估的思维方式,才能更好地传承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命题。福柯曾说,探究语言逻辑是“把握整个世界”的前提^[26]。按照他的逻辑,尼采给后世社会批判理论最大的启示在于拆解了全部的既定的认知体系。福柯认为,当认知体系的内在逻辑得以清晰展现之时,其原本依靠宏大叙事奠定的合法性地位便会随之消解。在他看来,尼采奠定的解构主义传统可以为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注入新的思想活力,从而可以建构起生命反抗技术的新的批判性理论。

按照福柯的观点,反抗技术统治的方式在于生命以他者的身份进行自主言说。他认为,人类文明始终排斥不被技术话语驯服的他者,这一问题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尤为明显,即以治理生命的方式全面规定生命的言说内容,使生命臣服,从而力求彻底消灭作为另类的他者。福柯表示,他者被治理,无法寻找自身的栖息之地,表明技术毫无疑问与生命无法真正共在,抵御资本主义的方式从不体现为要求表层的经济待遇,而是体现为扭转语言认知,使人类能够在摆脱技术语言的认知俘获之后在思想上真正独立起来。他认为,人类自主言说的前提在于认清精密的技术话语始终“利用”生命的事实^[27]。

福柯强调, 19 世纪的马克思由于未能在认知上颠覆技术话语, 因此无法真正找到生命获得解放的方向, 而现代资本主义技术统治的可怕之处很大程度上正体现为技术认知。他表示,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之中, 劳动者生命的反抗体现为对社会变革的期待, 但此种变革未能深入认知层面, 因而无法真正触及现代资本主义塑造和掌控生命的文化逻辑。福柯认为, 唯有在认知上不被俘获, 进行自主言说, 生命才能不受制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话语。

(二) 经典的魅力: 马克思主义的两种解读

尽管与马克思在观点上有所不同, 但是福柯从未否定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借鉴意义, 这在他后期的论述中有非常充分的体现。晚年的福柯曾多次探讨生产等概念, 他曾表示, 当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注重人口与财富的增长时, 与生产息息相关的“政治经济学”便建构起来了^[28]。对比福柯不同时期的论述可以发现, 生产、分工等政治经济学相关概念是他在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之后重点关注的对象。在提出生命政治学说之后, 福柯对政治经济学产生了空前的兴趣, 但这并不能说明福柯在后期由语言学风格浓厚的社会批判学者转变为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维护者。聚焦福柯晚年的论述, 不难发现他在孜孜不倦地探讨生产概念时, 仍然将掌控生命的技术语言规范视为塑造生产的终极力量。按照他的逻辑, 对政治经济学概念的引用并不等于认可在他眼中与实证主义相勾结的政治经济学, 相反, 对生产的探讨恰恰是为了深度阐明技术话语塑造并奴役劳动者的资本主义生产结构体系的本质。

相比福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批判性态度, 斯蒂格勒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表现出空前的青睐。斯蒂格勒认为, 福柯以来的左翼学者以语言学为逻辑起点批判马克思主义经典的观念是完全错误的, 经过语言学改造后的政治经济学根本无法展现出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核心逻辑。按照他的逻辑, 经福柯改造后的当代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论, 根本无法诠释技术在人类既往历史进程中的“变幻”逻辑^[29]。斯蒂格勒强调, 借鉴唯物史观我们可以发现, 技术孕育于人类世俗生活世界活动的历史进程中, 成为透视人类历史的具体、真实的窗口。与海德格尔一样, 斯蒂格勒承认技术对生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 技术结构是庇护生命的力量, 但任何的结构体系都不可能超越历史而独立存在, 其本身是人类具体的历史活动的产物。按照斯蒂格勒的观点, 海德格尔和福柯均没有关注人类在漫长历史进程中的真实体验, 而探讨“技术—生命”主题的根本前提在于引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视野。斯蒂格勒强调, 通过对人类研发技术的历史活动的诠释, 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将在当代得以复兴。

在斯蒂格勒看来, 生命对技术的过分依赖和技术在加速发展中的失控, 导致了人类在当代的自我迷失。原本保护生命的技术不再指引人类的认知, 这体现出技术与生命的当代悖论, 但这并不代表现实维度的消失——技术的产生、变革及失控性膨胀始终是历史性的过程。斯蒂格勒认为, 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语言, 而在于技术工具的空前复杂化对人类认知造成的混乱影响。他表示, 自 20 世纪以来, 技术工具的变化引起了基于技术媒介的文化叙事的加速改变。如他所述, 技术生活在工业革命之后被空前“放大化”^[30], 电影、电视等技术的出现便是技术为人类所带来的现代福利。斯蒂格勒强调, 技术在工业革命之后的颠覆性后果, 已无所不在地体现在人类社会的生产和日常生活中。他认为, 全新的技术载体事实上正通过前所未有的方式叙述人类社会的变化, 但眼花缭乱的技术成果使人类无法再通过当前的技术载体清晰地认知历史和现实, 这便是技术丧失保存生命功能的原因所在。也就是说, 技术与生命出现悖论的原因在于人类在实践活动中过分依赖技术, 唯有唯物史观才能让人类透视其内在逻辑。

(三) 唯物史观的复兴: 基于感性现实的生命体验

斯蒂格勒认为当代欧美左翼技术思潮应当承担的使命是: 重新定位技术在人类生命体验过程中的作用。他认为, 技术不再具备自身的记忆保存功能是人类认知迷失的内在原因, 语言学对当代技术“灾难性的本质”的历史根源的解释是乏力的^[31]。相比福柯的历史观, 斯蒂格勒更加注重以技术为主线的生产实践在历史中的基础性地位。他认为, 强调话语塑造历史的观点完全错误地解读了现实与语言

之间的关系,从不存在任何抽象演绎的语言结构。在斯蒂格勒看来,恢复技术性工具在欧美左翼叙事中的地位,完全不等于认可实证主义,以马克思主义历史视野诠释技术工具,完全可以超越英美实证主义的狭隘经验观。他强调,通过对技术工具与技术话语的现实关系的探讨,我们可以勾勒出人类社会的成长主线。斯蒂格勒表示,当代哲学家必须克服对语言学的迷思,重视以历史为基础的技术观。

从福柯到斯蒂格勒,欧美左翼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呈现出两种趋向。究竟应关注生命在技术体系下的主体言说,还是合理定位技术对人类生命的现实意义,福柯与斯蒂格勒作出了截然不同的阐释。他们既形成了跨时空的论争,也共在于“技术—生命”命题的情境中,体现出欧美左翼思潮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不同理解。福柯和斯蒂格勒都认为,技术加速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普遍现象,人类因技术的膨胀而面临困境亦是不争的事实。斯蒂格勒表示,理清“技术—生命”主题的关键在于,技术是否完全等同于必须被颠覆的现代资本主义统治方式。斯蒂格勒在论述技术与人类文明在历史时空中的内在关系时所抛弃的,正是福柯所坚持的最为核心的观点,即技术和现代资本主义一样都必须被彻底抛弃^[32]。对斯蒂格勒而言,技术是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的入口,反思的议题是技术为何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丧失其原本的功能,使生命无法基于技术媒介进行真实的体验。换言之,他认为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危害生命的文明形态,使技术本身出现了扭曲。这与福柯的逻辑完全不同。

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传承问题上,福柯代表了斯蒂格勒重构“技术—生命”命题时所反对的对象。福柯认为,思考生命与技术的关系,意味着在传承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命题时,探讨19世纪马克思未能意识到的语言认知问题,从而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建构起超越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社会批判理论叙事。按照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论述,必须从当代“危机的必然性和灾难性”中寻找不同于经典文本所处时代的当下之维^[33]。斯蒂格勒认为自己比福柯更倾向于从真实的历史活动中构筑起一种连续性的历史观,从而全面、系统和清晰地把握技术与生命的关系。从中可以看出,斯蒂格勒更加青睐马克思在批判费尔巴哈时所表达的观点,即过往社会批判理论的误区体现为“历史在他(费尔巴哈)的视野之外”^[34]。斯蒂格勒认为,当代左翼学者唯有注重对技术演变历史的诠释,方能以找回现实感为前提深刻反思现代资本主义的统治方式。他强调,马克思主义技术批判学者的使命应在于从历史时空的演变中考察技术工具与话语的交互关系,阐明人类通过技术保存记忆的生命体验,以实现唯物史观在欧美左翼思潮中的复兴。

四、结语

综上所述,斯蒂格勒对技术的探讨,在传承“技术—生命”叙事命题的同时,也在最大程度上重构了自福柯以来欧美左翼思潮关于技术的论述逻辑。福柯认为,技术对生命的唯一意义在于使人类成为技术语言结构配置下的驯顺的肉身,技术与生命的当代关系体现出现代资本主义运用技术话语统治世界的内在逻辑。自此之后,欧美左翼学者将技术视为吞噬生命的力量。按照福柯的观点,人类几乎不具备任何掌控技术的可能性。数十年来,彻底否定技术的情绪弥漫在欧美左翼思潮上空,在诸多左翼学者眼中,技术是威胁生命的可怕力量。但斯蒂格勒试图寻找技术对人类的积极价值,以一种不同于福柯的视角描述了生命与技术的关系。他认为,当下生命的认知迷失与技术息息相关,但这并不能得出技术与生命相互敌对的结论。斯蒂格勒表示,透过技术批判现代资本主义不在于分析技术语言结构,而在于探讨技术在加速演变中如何逐步丧失了为生命保存记忆的现实功能。他认为,技术与生命共在于日常生活世界,左翼学者应重新认可技术的正向作用,并基于人类历史时空的漫长演化历程来阐明技术与生命保存之间的深刻关系^[35]。

生命究竟是被技术所驯服,还是拥有自主运用技术得以自我保存的力量?斯蒂格勒与福柯对此在

思想逻辑上的冲突, 反映出欧美左翼思潮的转向, 即从极致化的语言学批判转向更加关注具体历史进程中真实存在的生命体验。斯蒂格勒对以福柯为代表的语言学技术观的反对, 反映出欧美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解读方式。对 20 世纪后期以来的欧美左翼思潮而言, 马克思究竟意味着什么, 他只是个崇尚生产主义的批判资本的先驱吗? 在斯蒂格勒看来, 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意义绝不是所谓的生产主义, 而是对现实世界的清晰揭示。他认为, 人类驾驭技术的现实历史是思考技术演化以及当代生命认知困境的基础。斯蒂格勒强调, 批判性理论不应忽视技术话语, 但不存在任何超越技术工具演化历史的语言。从中可以看出, 斯蒂格勒使唯物史观在当代欧美左翼思潮中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复兴, 然而马克思主义经典留给后世的财富远远不止于此。按照马克思的观点, 本体化的技术与生命词汇均是先验性的概念, 没有必要建立起所谓的技术批判理论^[36]。无论是福柯还是斯蒂格勒, 当他们探讨“技术—生命”命题之时, 便注定与马克思渐行渐远。斯蒂格勒的论述, 体现出部分欧美左翼学者力图找回感性现实因素的努力, 但这无法真正弥合欧美左翼思潮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裂痕。

参考文献:

- [1] 张旭. 欲望主体的谱系——论福柯遗著《肉欲的忏悔》的思想主题[J]. 现代哲学, 2024 (1): 93-100.
- [2] 李骏逸, 罗朝明. 福柯的直言[J]. 浙江学刊, 2024(3): 34-44.
- [3] 周雪健. 斯蒂格勒是加速主义者吗? [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5(6): 1-7.
- [4] 康德. 纯粹理性批判[M]. 蓝公武,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170.
- [5] FOUCAULT M. On the government of the living, 1979—1980[M]. BURCHELL G, tra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328.
- [6]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aeology of human sciences[M]. TAVISTOCK, trans. London: Routledge Classics, 2002: 153.
- [7] 尼采. 1887—1889 年遗稿[M]. 孙周兴,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4: 138.
- [8] FOUCAULT M.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SMITH A, tran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Press, 1972: 100.
- [9] BAUDRILLARD J. Forget Foucault[M]. BEITCHMAN P, HILDRETH L, POLIZZOTTI M, trans. Los Angeles: Semiotext(e), 2007: 29.
- [10] STIEGLER B. Symbolic misery 1: The hyper-industrial epoch[M]. NORMAN B,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1.
- [11] STIEGLER B.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M]. BEARDSWORTH R, COLLINS G,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 [12] 笛卡尔.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庞景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9: 43.
- [13] STIEGLER B. Telecracy against democracy[J]. TURNER C, trans. Cultural Politics, 2010, 6(2): 171-180.
- [14] 海德格尔. 思的经验(1910—1976)[M]. 陈春文,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8: 187.
- [15] STIEGLER B. Symbolic misery 2: The catastrophe of the sensible[M]. NORMAN B,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5: 32.
- [16] FOUCAULT M.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colleges of France, 1978—1979[M]. BURCHELL G, trans. New York: Houndmills, 2008.
- [17] FOUCAULT M. The punitive society, lectures at colleges of France, 1972—1973[M]. BURCHELL G, tra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105.
- [18] STIEGLER B. TECHNICS AND TIME 2: The disorientation[M]. BARKER S,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6.
- [19] STIEGLER B. TECHNICS AND TIME 3: Cinematic time and the question of malaise[M]. BARKER S,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63.
- [20] STIEGLER B. TECHNICS AND TIME 4: Faculties and functions of noesis in the post-truth age[M]. BARKER S,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150.
- [21] STIEGLER B. Automatic Society 1: The future of work[M]. ROSS D,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6: 20.
- [22] STIEGLER B. The re-enchantment of the World: The value of spirit against industrial populism[M]. ARTHUR T, trans. London: Bloomsbury Press, 2014: 29.
- [23] 尼采. 善恶的彼岸[M]. 宇锋, 译.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9: 100.

- [24] STIEGLER B.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M]. ROSS D,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0: 63.
- [25] FOUCAULT M. The courage of the truth 1983—1984[M]. BURCHELL G, tra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9.
- [26] FOUCAULT M. The Henneneutics of the Subject: Lectures at colleges of France, 1981—1982[M]. Macey D, trans. New York: Picador, 2005: 252.
- [27] FOUCAULT M. Society must be defended: Lectures at colleges of France, 1975—1976[M]. Macey D, trans. New York: Picador, 2003: 85.
- [28] FOUCAULT M. Security, territory, population: Lectures at colleges of France, 1977—1978 [M]. BURCHELL G, tran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137.
- [29] STIEGLER B. What makes life worth living[M]. ROSS D,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3: 40.
- [30] STIEGLER B. The neganthropocene[M]. ROSS D, trans. London: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8: 57.
- [31] STIEGLER B. The decadence of industrial democracies: Disbelief and discredit 1[M]. ROSS D and ARNOLD S, tran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3.
- [32] 林青. 基于《资本论》的权力形态分析: 马克思与福柯[J]. 哲学研究, 2023(11): 24–32, 128.
- [33] NEGRI A, Marx beyond Marx[M]. CLEAVER H, RYAN M, VIANO M, trans. New York: Autonomedia Press, 2001: 19.
-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51.
- [35] 孟强. 从《存在与时间》到《技术与时间》——斯蒂格勒对海德格尔的发展[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23, 39(3): 68–73.
- [36] 陈良斌, 王静. 马克思对黑格尔现实观的批判与超越[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30(3): 32–40.

The taming and preservation of life: The intellectual divide between Foucault and Stigler's technical views

JIANG Kaiyi¹, YU Shui²

(1. School of Marxism,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2. Department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In contemporary French left-wing thoughts, the narrative tradition of reflecting on modern capitalism based on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echnology and life is rooted in Foucault. He believes that capital relies on technological discourse to tame life in the name of governance activities, and that only by breaking free from the control of technological discourse and speaking independently, can life inherit the Marxist tradition of social criticism in ideology. Compared to Foucault, Stigler emphasizes more o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echnological tools and technological language. He contends that technology has an irreplaceable function in preserving memory in human history, and that the infinite acceleration of technology in capitalist society renders its original function ineffective, putting life at risk of preservation. Therefore, the way to inherit Marxism lies in repositioning the historical efficacy of technology. From Foucault to Stigler, the French left-wing movement has formed two paths in "the technology-life" narrative, reflecting the vastly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of Marxism by current left-wing scholars.

Key words: Foucault; Stiegler; technology; life; Marxism

[编辑: 胡兴华]